

改不动的机器：为什么改变的努力持续加固着它所触及的秩序

改革不是失败了，是被吃掉之后变成了那台机器的养分

作者 张琼 · SDE 学员 · 约 2.7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改变和不变，通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但在现代治理的核心场域，有一种更深层的机制在运转：改变的尝试本身，已经成为系统维持自身的最有效方式。不是改革者在撒谎，不是阻力太强，而是真诚的改变努力在落地过程中，被一套结构性的操作语法一步步翻译成了相反的东西——每一次“松动”都制造出它自己无法填补的合法性赤字，这些赤字又只能向旧秩序的核心逻辑借债清偿。清偿的动作被记录为“我们在努力”，其累积的经验则成为下一次改不动时证明“问题确实很复杂”的铁证。如此循环，从不间断。

本文追踪这套机制的完整发生过程。区别于既成对象式的事后诊断——将现象归类为“路径依赖”“表面改革”或“目标置换”——本文采用发生学眼光，锁定高考改革中的自主招生政策从启动到被收编的微观全周期，按时间顺序重构“被感知的松动→应激式收编→代谢性加固”三重动力的衔接链条。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为辅助案例，展示同一机制在其他场域的变异形态，并与布迪厄再生产理论正面交锋，论证自噬性稳态如何切出一个已有概念无法触及的辨别面：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系统在运作自身逻辑中自动完成支配，而自噬性稳态追踪的是，这个“自动”过程在哪一个具体的操作环节上是可以被中断的。最后，本文为自噬性稳态给出可操作的打断路径与明确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 自噬性稳态；改变-不变悖论；应激式收编；发生学；高考改革；再生产理论

一、一种说不清的沉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你问一个曾经推动过高考改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省级教育官员，一个高校招生负责人，一个政策研究室主任——问他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做了什么，他会给你拿出厚厚一沓文件、数据、案例。他会告诉你，他们在哪个年份推行了自主招生试点，哪个年份调整了综合素质评价的权重，哪个年份在某个省份率先实现了“多元录取”的突破。他说这些的时候，是真诚的。这些事确实都发生过，并且都是他亲手操办的。

但如果你把语气放慢，把问题换成：“那你觉得，现在的高考，和你二十年前刚入行的时候，最根本的那套东西——分数决定命运、一分压倒一排人、所有人对‘公平’的唯一想象还是‘考一张卷子’——它有变吗？”

他会沉默。

这个沉默不是无言以对。它是一种在身体里积压了多年、却从未被认真地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疲惫。他曾经相信那些改革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去的。但他也很清楚，每一次改革在事后的收束中，都似乎被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回了原点。他不能说改革没发生——那是昧着良心。他也不能说改革推动了根本改变——那更是昧着良心。所以他沉默。这种沉默，在社会学的既有语汇里，找不到一个精确的名字。

这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说的是惯性锁死——一套制度因为正反馈而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但高考不是“没人动它”——它在三十多年里被激烈地、反复地、以最高行政级别地“动”过。它的考试科目变了多少轮？录取通道增加了多少条？每一次都是真金白银、大动干戈。路径依赖解释不了为什么越动越锁。

这也不是“表面改革”。表面改革预设的是虚伪——改革者一开始就没想真改，只是做样子给外面看。但那个沉默的人，他一点都不虚伪。他是真心实意地推过那些在他看来“这次肯定能砸开一道缝”的方案。他的沉默，恰恰是因为他的真诚被辜负了，而他在被辜负之后，却无法指出那个辜负他的结构到底长什么样。

这更不是“渐进制度变迁”。渐进变迁说的是制度在缓慢地、一点点地在改变，你只是没耐心等。但我说的这个沉默，它不是在等待过程中的焦躁。它是一个经历过从希望到疲惫的完整周期之后，沉淀下来的认知：这个系统确实在“变”，但每一次变完之后，那个把亿万人拧在一根轴上的核心逻辑——分数就是命——反而被裹得更紧。这不是变的太慢，这是变的方向在某个看不见的拐点被掉了包。

本文要做的，就是给这个沉默一张可以被公开指认、争论、拒绝的语法。本文不是在宣告“改革是无用的”——那是虚无主义。本文是在追踪一套至今没有被精确命名的发生机制：一个系统的自我修正程序，是如何在其每一次被真诚地启动之后，被既有的旧语法一步步翻译回旧逻辑，从而在“改变”的持续发生中，完成了对深层秩序的最彻底加固。本文称这套机制为自噬性稳态。

这个名字不是修辞。在细胞生物学中，细胞在遭受损伤时可以启动“自噬”（autophagy）——降解掉自身一部分受损结构，来回收能量和原料，以维持整体的存活。降解自身的动作，既是破坏，也是修复。而被降解掉的那些“受损部分”，原本就是细胞为解决上一轮损伤而生成的结构。社会制度里的自噬，走的是同一条路：制度承受变革压力时，它启动改革——这是自我修正。但在修正过程中，它吞掉的不是外来的冲击，而是那些凝聚在它身上的变革期许本身。这些期许被消化之后，变成下一次回应变革期许的能量——而那个本该被触动的地基，在这场持续的自我修正中，反而更深地沉入了不可问的夜色。

本文将论证：在一个已经高度治理化的现代社会里，维持系统稳定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拒绝改变，而是通过持续启动改变、吸收改变、将改变动能转化为自身结构硬度的再加固，从而使每一次改变之后，系统对其深层逻辑的锁定比改变之前更加严丝合缝。

论证将按以下路径展开。首先，我将在与路径依赖、表面改革、渐进制度变迁、目标置换等概念的正面交锋中，确立自噬性稳态不可还原的辨别面。然后，我锚定高考改革中的自主招生政策，按时间顺序完成一次完整的发生过程追踪——从它在纸面上被设计出来的那一刻，到它被一轮轮争议、调整、收紧所收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将展示，“被感知的松动”、“应激式收编”、“代谢性加

固”三重动力是如何在同一个时间轴上依次被激发、彼此推挤、共同完成自噬的闭环的。随后，我将以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为辅助案例，展示自噬机制在其他场域的变异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我将逼问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它已经捕捉到了自噬的一部分？又在什么节点上，它解释不了自噬——因为再生产理论中那个“自动翻译”的过程，恰恰是自噬要去拆开的黑箱？最后，我将为自噬机器的运转指出明确的脆弱环节，并论证打断它的操作路径——不是靠更宏大、更真诚的改革，而是靠那些细微到不会被应激式收编盯上的日常动作。结论部分，我将把这篇论文本身推上证人席，逼问它如何避免被自噬收编的命运，并给出使本文理论可被证伪的严格条件。

二、它不只是另一个名字

一个新概念的出场，如果不能逼问既有的理论去重答它们各自最核心的问题，那它不过是换了一件衣服。本节的任务，就是把自噬性稳态推上与那些最接近它、最可能替代它的既有概念的对话席，证明它切出了一个它们都尚未切到的辨别面。

2.1 路径依赖：锁死的是制度形式，还是应对改变的结构？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论述中，路径依赖的机制已经说得很清楚。一次早期的偶然选择，由于正反馈——高固定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变得越来越难以偏离，最终“锁入”一条轨道。QWERTY键盘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用QWERTY键盘。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糟糕的制度在没人主动想维持它的情况下，依然死不掉。

但它解释不了高考。高考不是没人动——它是全中国最被激烈地、反复地、以最高行政级别去“动”的一项制度。从3+X到自主招生，从综合素质评价到强基计划，几乎每五年就有一轮重大的方案调整。路径依赖的核心机制是正反馈：既有制度因为被更多人采用而越来越难以偏离。但在高考的案例中，最强烈的改变冲击——最高级别的政策动员、最大规模的社会讨论——不但没有打断正反馈，反而激活了更深的锁定。改变冲击越强，系统为应对这些冲击而启动的自我修正程序就越密集，锁定的效果就越显著。这是方向的相反。

更深一层的差异在于锁定的对象。路径依赖锁定的是制度的特定形式：键盘布局、汽车能源路径、某种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在高考三十年的演变中，制度的形式一直在变——考试科目变了不止一轮，录取通道新增了不知多少条。锁死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而是那套“把任何新形式都收编回分数独断逻辑”的应对结构本身。这套结构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而存在——反过来，它通过持续翻新制度形式来维持自身的不被动摇。路径依赖说“选择空间在缩小”——你走着走着，其他岔路消失在身后。自噬恰恰相反：它通过不断创造新的选择（新通道、新标准、新评价方式），来维持“实际上你只能走那条路”。这不是程度的差异，这是锁定的维度已然不同。路径依赖锁定的是形式，自噬锁定的是一套如何回应改变的操作语法。

2.2 表面改革与表演性合规：预设虚伪，解释不了真诚

在一种影响深远的批判社会学传统中，教育系统被揭示为一个嘴上说促进流动、手上却在把阶级惯习翻译成学业成绩的装置。它的“公平”话语，在这个视角下，不过是一套掩盖再生产的意识形

态。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改革改不动”就很容易被归因于“那些改革本来就是做样子的”。这不就是“表面改革”吗？

但那个沉默的人不虚伪。他不是在做样子。他花了半辈子去推动那些他真心相信“这次不一样”的方案，承受了真代价，付出了真努力。他被辜负了，不是因为他被骗了，而是因为他身处一套他无法看见的结构中。这套结构能让一个人用真诚的行动，去持续加固他想要推翻的那堵墙。“表面改革”预设了虚伪，而自噬最可怕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依赖虚伪也能运转。它的收编不需要任何人故意“做样子”——它只需要每一个改革者在进入争议现场时，身不由己地向那套唯一拥有公共信用的旧规则借合法性。这个借的动作，在任何一颗真诚的心里，都可以被体认为“这是为了大局考虑”“这是现实主义的操作”。真诚，在这里不是自噬的例外，而是它的燃料。

同样的逻辑切开了与“表演性合规”的区别。表演性合规是组织用象征性的话语去掩盖实质上的不作为，行动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自噬是结构的：行动者尽其一生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改革，而在他死后，他参与改革所累积的全部制度性后果，就是把那块地基夯实了。前者需要坏faith，后者恰恰在好faith中完成了最彻底的收编。

2.3 渐进制度变迁：制度在变，还是不变通过变在加固？

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一套精致的工具箱：行动者可以通过“层级化”（在不推翻旧规则的情况下附加新规则）、“转化”（把旧规则用于新目的）、“漂移”（让旧规则在社会环境变化中产生新的效果）等策略，在表面不变的情况下，把制度的内核一点一点地置换掉。这套理论非常有力，它打破了“制度要么变要么不变”的二分法，把变迁重新理解为一种在制度的缝隙中持续发生的微观政治。

但高考三十年的故事说的，几乎是渐进的镜像：层级化在不断发生——加分、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一层一层地加上去——但这些层次在每一次被“规范—反弹—收紧”的循环捆过一遍之后，不是把旧核置换掉，而是被旧核吞了回去，变成包裹在旧核外面的一层层更紧的膜。不是规则被架空了，是新规则被旧规则“消化”了。渐进变迁理论预判了行动者的策略性操作能改写制度，但它没有预判一种情况：当行动者用来改写的工具——他使用的语言（“公平”“科学选才”）、他所依据的合法性尺度（能否产出可比较的结果）、他所要争夺的资源流向（政策合法性）——全都是由他试图改写的那套核心逻辑预先塑造的时候，他的改写操作，是否还能朝向旧制度之外？

自噬不是“没有变迁”。自噬是“变迁的发生方向，被旧语法提前收束在了一个它允许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内，制度在变，制度的形式在翻新，制度的话语在进化——但让它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那条深层支配逻辑，从未被这些变迁真正触及。渐进变迁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反向的悖论：为什么制度“变”得越多，其支配性的语法反而越难被触及？因为它的理论眼睛里，看的是规则层面的位移；自噬追踪的，是规则位移中被每一轮“合法性清算”不断重新抬高的那个旧标杆。规则在变，标杆在升。

2.4 目标置换：不是忘记，是翻译

还剩下一个最危险的手。组织社会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目标置换”——组织在运行中，将原本作为手段的规则、程序或次级目标，逐渐当成目的本身来追求，从而置换掉了原始使命。用目标

置换来解释高考改革，看起来几乎能完美贴上去：改革一开始的目标是“破除唯分数论”，但设计新评价标准、搭建新信息平台、培训评定人员这些“手段”，逐渐变成了教育管理部门追求的新目标——他们忙着“做改革”，忘了“改什么”。

但这个解释有一个致命的盲区。目标置换的前提是：原初目标被遗忘或搁置了。行动者不再朝向那个目标努力，而是朝向一个替代目标努力。但在高考改革中，“破除唯分数论”这个目标从未被遗忘，也从未被搁置。每一轮新方案的文本都在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申它；每一个推动者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在朝它前进。问题不在于目标被置换，而在于这个目标本身——在现有的制度语法里——只能通过那些最终会加固旧逻辑的手段去追求。

这里需要正面展示这个逻辑。什么是“破除唯分数论”？意思是在录取决策中，让分数的独断权被部分地稀释掉，让其他维度的评价——人的素质、潜质、创造力的迹象——也拥有不可被分数化约的说服力。但你要让这些新评价方式在这个制度里立住，它首先必须被公众接受为“公平”的。在一个已经被分数独断驯化了数十年的社会里，“公平”的可信度只有一个来源：不可争议的比较。一件事是不是公平，不是看它是否更全面地呈现了一个人，而是看它的结果是否排除了“人的判断”——因为人的判断，在这个社会记忆里，就意味着可能的不公。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公平的，新评价方式必须比旧分数排序更精细——更细的指标、更密的记录、更系统化的比较。改革一开始说的是“松绑”，但它为了自证清白，被迫走上了一条“换一台更精密的绑绳机器”的路。不是行动者忘了初衷，是初衷和手段之间的那道裂缝，是结构性的。初衷是松绑，但松绑所必须借助的那个合法性语言，恰恰是由被绑绳机统治了数十年的公共信任垄断供给的。

目标置换说的是“目标被手段吃掉了”。自噬说的是“目标在每一次被真诚追求的过程中，被手段所依赖的那套旧语法给翻译回了旧逻辑”。不是忘记，是翻译。不是背叛，是收编。

2.5 回归那个沉默

至此，我将自噬性稳态压成50字：一个系统的自我修正机制在持续吞噬变革动能，使核心支配逻辑在每一次“改变”之后更不可撼动的悖论性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既有概念能1:1替换它。路径依赖替换不了——它说的是惯性锁死，不解释越改越锁。表面改革替换不了——它预设了虚伪，不能处理真诚。渐进制度变迁替换不了——它说的是制度在变，自噬说的是不变通过变来加固。目标置换替换不了——它说的是遗忘，自噬说的是翻译。

但还有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必须先被按住不表，待完成过程追踪之后再拉上擂台正面交锋。它就是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已经论证了教育系统如何通过将阶级惯习“翻译”成学业成绩，从而把社会不平等“再生产”出来——这里面同样有“翻译”，同样有“系统在运作自身的逻辑中完成支配”。如果自噬只是再生产理论的某个特例或翻版，那本文的概念就是多余的。这个问题必须被真诚地逼问，而不是回避。本文将在第四节的末尾，在对自噬的发生过程完成了详实的追踪之后，带着这个过程的全部经验细节，去正面叩问再生产理论：在什么节点上，它那个由结构自动保证的“翻译”过程，恰恰是自噬所要拆开的黑箱？

三、谁在吞掉改变？一次完整的过程追踪

一个概念如果把它的判断停在“它是个悖论”上，它就还没跳出既成对象式的相册。发生学的笨重之处，在于它必须蹲下来，用追踪一个活物在时间中如何在具体场景里被一步步推着走的耐心，去写那个概念所指向的过程。它不是用例子去“佐证”一个已经设定好的理论，而是让理论在过程中重新发生一次。

本节在本文中的分量，不是“提供一些案例”——它就是本文的核心论证。放弃这个微观追踪，自噬就只是又一句漂亮的悖论。从命名一个现象到追踪它的发生，就是本文从既成对象论跃迁至发生学的关键一跃。

3.1 案例选择与理由

本文选择自主招生政策作为发生过程追踪的核心锚定案例，基于以下考量：

第一，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史上最接近“触及分数独断逻辑”那根轴的一次尝试。不同于3+X（改变考试科目组合但保留统一考试）或综合素质评价（从根本上就以“参考”而非“硬通”的模糊地位被设计），自主招生从纸面设计上就承诺了这样一件事：高校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面试、材料审查、对特长与潜质的直接评估——来决定录取谁，而不再仅仅依据一个由统一考试产生的分数排序。这是高考制度自恢复以来，第一次在正门上开了一道可以绕开“一分压倒一排人”的缝。

第二，自主招生政策经历了从高调启动→广泛争议→多轮收紧→实质边缘化的完整生命周期，时间跨度接近二十年（2003年首批试点到2020年“强基计划”替代），政策文本、媒体报道与公共讨论极其丰富，构成了一份天然的发生过程档案。这使研究者可以在不依赖内部访谈的情况下，通过公开文本追踪该政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被什么力量、用什么语法、做什么样的操作推向了收编。

第三，自主招生政策的命运，构成了对既有制度变迁理论最严苛的测试。如果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是对的，那么自主招生带来的“人的判断”这个新元素，应该能通过行动者的策略性操作（比如高校不断争取扩大自主权、绕过统一考试的约束）逐步改写制度内核。如果路径依赖理论是对的，那么自主招生从一开始就不该被允许出现——因为分数排序这个“锁入”的制度应该排斥一切偏离它的尝试。但实际上，自主招生不但被允许出现了，还在出现之后运行了将近二十年——并在这个过程中，越运行越被收束回了分数排序的逻辑。这正是自噬有别于二者的独特运转方式：不是排斥，是吸收。

3.2 被感知的松动（2003-2009）

自主招生试点在2003年正式启动。政策文本规定，经批准的高校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对“具有特殊才能”或“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进行自主选拔，入选考生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在操作上，高校自行组织笔试、面试或材料审核，提出候选人名单，学生仍需参加高考但录取分数线可降低。

这个政策在头五年的落地形态，是“被感知的松动”几乎最纯粹的展现。从基层中学的动员话语来看，各重点中学迅速将自主招生解读为“偏才怪才的通道”。这是一个极其吊诡但极具动员力的修辞：偏才——在某个单一维度上极具天赋但在其他维度上不突出的学生；怪才——在现有评价标准下完全无法被识别、但可能极具创造潜力的学生。这个修辞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挑战分数独断

的合法性（它没有说分数是错的），而是在分数独断的秩序旁边，开了一个“例外”的窗口。它暗示：我们承认分数是主流，但请为那些无法被分数归类的异数留一条活路。这个姿态让它在舆论上几乎无懈可击——反对自主招生，就意味着反对给异数一条活路。

在政策文本和高校执行层面，这个“松动”是真实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高校迅速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招生笔试与面试体系，有些高校的面试环节设计得相当细致——多对一、情境模拟、开放性提问——远非走过场。一些在这场选拔中被识别的学生，其后续在一流大学中的表现，也反过来为这个通道提供了“它确实找到了分数找不到的人”的体感证据。

但转译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被埋下的。自主招生的合法性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建立在它识别“除了分数高之外还有别的值得被录取的东西”的能力上。这也就是说，它必须具备一套不同于却又不弱于分数排序的可信度机制。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土壤里，“不同于分数”本身就意味着“可信度处于结构性赤字”。因为在你拿出第一份可以被公开接受为“公平”的自主招生录取名单之前，社会的默认设置是把一切不通过统一分数排序的选拔都归入“可操作”的怀疑区。这个怀疑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一个记忆：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判断”在分配稀缺资源时，从未被赋予过免于审查的信用。

在这种结构性赤字下，各高校的选择是高度一致的：把面试评分标准化。不是让教授天马行空地谈印象，而是设计评分表、分级打分、取平均值。这看起来是在提升“公平性”，但它也悄悄地完成了一次语法上的转译——自主招生从“识别分数尺子量不出的东西”，变成了“拿另一把尺子再量一次”。而一旦进入了“尺子量”的语法，它就自动落入了和分数排序同台比较的赛场。在这个赛场上，分数的可信度是百年积累，你这把新尺子的可信度才刚起步五年。你不可能赢。

这个阶段的关键转折发生在2009年前后。随着自主招生规模扩大，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两类现象：一是“自主招生变成小高考”——各高校的笔试难度急剧攀升，学生在高三上学期不仅要准备高考，还要准备另一场甚至比高考更难的学科测试；二是“寒门难出贵子”——自主招生中，来自城市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学生比例显著高于他们在高考统招中的比例。第一类报道动摇了自主招生的“识别不可被分数衡量之才”的功能合法性——如果它只是一场更难的高考，那它存在的必要性何在？第二类报道动摇了它的道德合法性——你说是给异数一条路，结果这条路更多地给了那些已经占有很多路的人。

至此，被感知的松动开始向内塌缩。它已经成功动员了社会对“分数之外”的期待，但它在动员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偏才怪才的通道”）和它所必须依赖的操作语法（标准化评分），为下一步的收编提供了现成的轨道。

3.3 应激式收编（2010-2018）

2010年至2018年，是自主招生从“开放的例外”被系统性地收编回分数排序逻辑的关键时期。这个收编不是在某个会议上由某个人拍板完成的，而是通过一连串分散的、各自有其正当理由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调整，被逐步实现的。本文在此处要追踪的，不是“谁收编了它”，而是“收编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操作语法完成的”。

第一步收编：量化折算。自主招生选拔出来的学生，最终还是要参加高考的。政策设计初期，自主招生的录取规则通常是“达到一本线即可录取”或“降若干分录取”。这个设计保留了自主招生作

为一个独立通道的性质——它不需要去和统招生的分数比高低，它只需要证明自己挑的人达到了一个基本的学业门槛。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达到门槛即不论分”的逻辑，极其迅速地遭到了从高校招生办公室到家长群体的集体排斥。因为它制造了一个不可解决的困境：一个凭自主招生被相中的学生，高考分数大幅低于同校统招生——当这两个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前者在学术表现上并不比后者差时，分数作为公平排序唯一尺度的正当性，就被置于了令人不安的质疑中。而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多做解释”来平息的不安——它直接动摇了高考制度作为社会契约的核心条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自主招生如果让一个考分低的人和一个考分高的人上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它就不再是“补充”，而是“特权”。

各地的回应方式高度一致：将自主招生优惠分数压缩，并将最终录取折算成一套可与统招排序进行对比的综合分。这个操作在技术层面完全合理——如果不这样折算，录取结果的“公平”无从自证。但它造成的结构效果是把自主招生重新翻译回了分数排序的语言。它不再是“在分数之外”录取学生，而是“给某些学生加分”后与统招生一起排序。“加分”和“在分数之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前者接受分数的终极裁决权，只是要求在这项裁决中加入一个可以被分数化的修正项；后者则拒绝将全人置于分数尺下，要求保留一部分不可分数化的判断空间。折算操作把后者转换成了前者。

第二步收编：制度化的合法性上贡。 2014-2015年间，自主招生经历了一轮密集的政策收紧。教育部出台明确规定，自主招生名额不得超过当年招生总数的5%，笔试原则上不超两门，考核内容不得以偏题怪题“掐尖”，招生程序必须全程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这些规定，每一条拎出来都是合理的——它们是对此前媒体密集报道的“自主招生变成小高考”“寒门难出贵子”等问题的制度化回应。但它们的总体效果，是让自主招生从“一套独立运转的识别机制”转变成“一套在严格管控下被允许试探边界的例外程序”。其中最具有结构意义的是“不得以偏题怪题掐尖”这一规定：它在实质上摧毁了自主招生唯一可能的、区别于分数选拔的逻辑——用非常规问题去探测分数无法测出的思维的韧度、创造力的质感、面对未知时的不退缩。一旦这个探测行为被禁止，自主招生就将自己剩下的“笔试”功能完全交还给了分数选拔的老路——而面试，在没有强效识别信号支撑的情况下，沦为了对“表达能力”“礼貌程度”“自信水平”这些高度阶层化的惯习指标的默会打分。

这里有必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来命名这一步收编的动力学：合法性朝贡。 每一次当自主招生存续的可接受性遭到挑战时——一次被广泛报道的招生丑闻、一年被拉大的城乡录取差距——它的捍卫者不是通过论证“我们这套方式的公平性建立在对公平的另一种理解上”来反击，而是通过把自主招生更紧地捆绑在旧规则的合法性来源上，以平息争议。具体操作包括：增加程序的透明度（全程录像）、严格限制面试打分的主观幅度（必须给出具体评分依据）、将选拔标准中的“可量化部分”不断扩大（获奖证书、发表论文、发明专利）。这些操作的共同语法是：自主招生不是一套自证其合理性的独立系统，它必须定期向分数排序所垄断的公共信任进行合法性上贡，以换取自己暂时的、有限的存在许可。每一次朝贡，都在事实上把那个被朝贡的对象——分数排序——从“诸多标准之一”抬升成了“所有其他标准的最终合法性仲裁者”。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用来选拔的工具；它变成了用来判断其他选拔工具是否公平的元标准。

第三步收编：信任坍塌与通道关闭。 朝贡做到极致，不是保住了自主招生——是耗尽了它。当自主招生已经把能比的分数都比了、能加的标准化合加的都加了、能做的程序透明都做了，它剩下的那个初始承诺——找到分数找不到的人——就被彻底架空了。2018年至2020年间，自主招生出现了一系

列引发社会信任崩塌的事件：论文造假、专利买卖、证书产业链被曝光。社会舆论的反应极其统一：“还是分数最公平。”这个反应的深层逻辑不是“分数很好”，而是“在所有的坏选项里，分数是那个我知道它坏在哪里的选项”。人们宁愿接受一个已知的、单一的、冷冰冰的数字裁决，也不愿接受一套声称能看见“人的复杂性”却不断被证明在看财富、看关系、看阶层的评价体系。这个选择的悲剧性在于：它完全合理。自主招生在被收编到了自己只剩一张皮之后，这张皮里藏着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东西，自然就涌了出来。而它的涌出，又反过来为“只有分数最公平”这个判断，提供了一次极其体面的新的证据。

2020年，自主招生正式被“强基计划”取代。强基计划把招生范围严格限定在基础学科领域，名额极度压缩，选拔标准高度同一化。旧自主招生那个“为偏才怪才开一道缝”的承诺，至此在制度文本上被彻底遗弃。这不是某个决策者突然变保守了——这是长达十余年的应激式收编的终局。收编的每一步都极其合理，但每一步都在把曾经的那道缝，填得更死。

3.4 代谢性加固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它只是一次“改革失败”。但自噬的闭环，在其第三阶段才真正完成：系统从这次完整的“松动→收编”循环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生产出了它在改革之前不拥有的、新的稳定化能力。本文称这个能力为代谢性加固——系统把改革的挫败排泄出去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它能在下一次继续站立、继续“在被改”、继续不被动到根基的全部养料与支撑。

第一层加固：话语层的认知闭环。自主招生这十多年的历史，在教育政策研究界和公共舆论中被怎么样讲述？最常见的叙事是这样的：“自主招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探索，但由于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监管存在漏洞、改革操之过急等原因，最终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教育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在社会大环境成熟的条件下渐进推进。”

请注意这个叙事句法的精妙之处。它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这是外部环境；“监管存在漏洞”——这是执行层面；“改革操之过急”——这是节奏问题。它没有一处触及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自主招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死法，因为在分数独断作为元标准的制度语法里，任何试图给“人的判断”赋权的尝试，都会被它自己的合法性获取机制逼进“标准化→被质疑→再加程序→信任耗尽→自爆”的死胡同。这个死胡同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不是执行不力造成的，不是操之过急造成的——它是一套逻辑的必然产物。但那个叙事句法，极其得体地把所有的反思力都牵引到了道德层面和执行层面，放过了一直在运转的那套深层语法本身。自噬运行得越久，这个句法在制度内部就被重复得越熟练，最终被内化为一种“反思过了”的集体体感——我反思了监管漏洞，反思了诚信缺失，反思了操之过急——所以我很深刻，所以我已经吸取了教训。至于那个一直在转的深层语法？它从来没有被登上过反思的议程。

第二层加固：制度能力层的行动体感填充。自噬并不会让制度一无所获。自主招生虽然死了，但它留下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全国各高校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评价工作机构，积累了组织面试、审核材料、管理公示流程的完整经验；教育部建立了自主招生的监管信息系统；一批从事教育评价研究的专家团队获得了项目经费和制度嵌入位置。这些东西不会随着自主招生这个名称的消失而消失。它们构成了下一次改革最重要的一种资源：一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事了”的体感。

这个体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心理安慰。当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倡议者再次提出“应该打破分数独断”时，反对者不需要论证这不可能。他们只需要拿出一沓材料——列出过去二十年里历次自主招生的政策文本、数据总量、参与高校、培训人次——然后问一句：“我们做的还不够多吗？”这一问，不是反问。它是真诚的。因为从内部执行的视角看，他们确实做过很多事。这些事是具体的、可被核查的、在每一次年终总结里都填满过好几页的。他们的行动体感和外部的“什么都没变”的体感，在此处已经不在一个世界里了。而这个被充实的内部体感，构成了自噬对下一轮变革冲击最坚固的防火墙——不是靠打压，是靠“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做了”，有文件、有数据、有案例来撑住它，它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正式汇报和检查。

第三层加固：对改变无法完成的解释框架。自主招生失败的经验，最终不是被处理为“我们需要改换语法”，而是被处理为“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每一次自噬循环的收束，都被吸收进下一次改革的话语里，作为“我们之所以需要继续改”的理由。改革失败的历史，不是改革的伤口——它是改革继续发生的燃料。在2021年之后的教育政策讨论中，“综合素质评价如何真正落地”这个议题，已经自动配备了自主招生十多年的全部失败教训来作为它的论证背景。每一次讨论到最后，参与者都会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句话从一方面听，是客观的——它确实复杂。从另一方面听，它是一种无限期免责声明——因为它复杂，所以你没资格要求它现在就解决；因为你没资格要求它现在解决，所以它下次还可以拿复杂度来作为它还没解决的合法解释。而当这个句式循环足够多次之后，公众的耐心磨损了，学者们转向了别的议题，媒体的关注转移了——剩下来的，是一座被“复杂”二字重重包裹起来的、谁也碰不得的铁壳。

三重代谢——话语层的认知闭环、制度能力层的行动体感填充、关于改变无法完成的解释框架——合在一起，把一次完整的自噬循环排出的废物，变成了下次自噬循环的养料。自主招生这条轨道断了，不等于自噬停了。它只意味着自噬有了一个新的材料库：一个被反复证明“草率不行”的先例，一批被反复训练过“知道怎么搞多元评价”的人，一套被反复加固过的“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的话语。这些材料，不会在下次改革中被闲置——它们会主动组成下一套改革方案的起点：不要操之过急、要规范化、要加强监管、要完善诚信体系。然后这套新方案再走一遍完整的自噬循环，再给那个“复杂”的论证加厚一层。自噬最深的恐怖不是它吞吃了一次改变，而是它把每一次被消化掉的改变的遗骸，都变成了让它自己更强壮、更难以被下次改变所打动的骨骼。

四、它不只发生在高考里

在第二节，我把自噬和其他几个最接近它的概念拉开了距离。在第三节，我在高考改革的自主招生案例中，按时间顺序追踪了它的完整发生过程。现在我有资格回答一个必须被追问的问题：这套机制是否只是高考这个特定场域的孤例？如果自噬性稳态只是一个碰巧在高考改革中运转的逻辑，那它就还没有达到它自己声称的普遍性。

本节的任务是把追踪的焦距拉远，看同一个逻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域——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中如何运转。我不会在这里做第三节那种密度的过程追踪（那是另一篇论文的工作），但我会指出完全同构的动力链条：被感知的松动、应激式收编、代谢性加固。这构成本文的辅助案例，它的功能不是“再增加一个自噬的例子”，而是让读者看清自噬不是一套依赖特定制度特征的机制——

它是一套只要某个场域同时存在“必须改变的压力”与“不可被挑战的核心语法”，就会自动启动的稳态逻辑。

与此同时，在这个比较中，我将正面回应一个在第二节末尾被按住的、自噬必须面对的最强大的对手——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已经揭示了教育系统如何通过将阶级惯习“翻译”成学业成绩，从而完成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这其中充满了“翻译”的操作。自噬如果只是“再生产理论的一个特例”，那它就是不成立的。我必须在这个案例中，精确地指出再生产理论的“翻译”和自噬的“翻译”在哪个地方分道扬镳。

4.1 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越关爱，越无力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投入的资源增长，几乎可以说是社会政策史上的一个奇迹。各级政府出台的专项政策逐年递增；学校心理咨询室从无到有、从有到标配；心理健康课程进入了课表；危机干预热线覆盖了全国；班主任被要求定期参加心理健康培训。这项事业的真诚度，不应该被任何人轻易质疑。那些在深夜接听危机热线的志愿者、那些在一线被学生的痛苦淹到不知所措的年轻心理老师、那些在财政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拨出专项经费的地方官员，他们的努力是具体而微的。

但有一个数据，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回避的：在同一时期，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和严重程度，持续上升。这两个上升斜率之间的关系，是自噬在健康治理场域最赤裸的展演：我们不是在通过增加关爱去击败危机，我们是在和危机赛跑——而且一直跑平。这个跑平本身，就是自噬机器的产品。

被感知的松动在此处同样存在：每一次新的心理健康专项行动，都带着一套动员话语——“关心孩子，不能只看分数”“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学校不是只有考试”。这套话语在舆论场中几乎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它成功地让教师、家长、社会各方都感知到了一种“这次我们是认真要改变唯分数论对孩子的伤害”的氛围。

应激式收编在这个场域有它自己的版本。这套心理健康话语在穿透进家庭和学校的日常操作后，立刻撞上了一堵它不是一堵墙，而是一种流体式的消力墙。在每一个具体的深夜，当家长坐在孩子书桌前，心里同时装着“心理健康讲座上说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和“班主任说这次模拟考排名很关键”这两条互相矛盾的信息时，他能怎么选？他没有选择。因为那个以分数独断为轴心的选拔制度，没有为“关心心理健康”这个指令提供任何可执行的结构性的落脚点——它只提供了情绪上的安慰。“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是一个情绪指令，但“这次考试排名会影响到分班”是一个结构指令。情绪指令在结构指令面前，永远是弱势方。因为它不附带任何后果。你不听情绪指令，没有人来问责你。你不听结构指令，孩子下一轮就可能掉出重点班。

但收编的操作比这个家庭内部时刻要精致得多。学校层面的收编，不是压制这套话语，而是把它纳入一个可管理、可汇报、可不触及压力根源的行政轨道。你需要证明学校在关心学生心理健康，怎么证明？很简单：开展了多少次讲座、配备了多少名心理老师、建立了多少间咨询室、处理了多少起危机事件。这些指标被忠实地记录、归档、上报，作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扎实有效”的证据。在这个轨道里，心理健康从一个指向“我们必须改变什么”的批判性话语，被成功翻译成了一个指向“我们做了多少”的绩效话语。这两个话语之间的差别，就是自噬在这个场域完成收编的核心机制。关

心，被做成了可以被考核的指标。而指标达标的那一刻，关心的原始动能就被耗尽了——因为关心一旦变成了任务，它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追问了。任务完成了，追问就可以停了。

代谢性加固随后闭合。青少年心理问题越严重，证明我们的关爱还不够，所以需要更多的投入。投入更多之后，问题依旧加重，则证明心理问题“确实是一个极复杂的社会工程”。“复杂性”在此处，和高考场域里的“复杂性”承担了完全同构的加固功能：它成为系统自我保护的终极盾牌。它让每一次“投入—恶化”的循环，都被合理化为“我们在和这个复杂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非“我们的斗争方式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结果是，这套治理机器产出了一套越来越厚重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它有标准、有督导、有培训、有数据——和一个越来越深入地沉入悲观的学生群体。体系越完善，无力感越强烈。这不是“关怀失败了”——是关怀在自身运作中被做成了一套自噬装置。

4.2 与再生产理论的正面交锋

现在我有资格把布迪厄请上场了。

布迪厄和帕斯隆在《再生产》中的论证以其最深的那条逻辑来说，大致是这样：教育系统通过将特定阶级的文化惯习——语言方式、审美趣味、与知识建立关系的方式——“翻译”为普遍性的学业评判标准（“天赋”“努力”“聪明”），从而在事实上完成了阶级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这个系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在故意偏袒某一个阶级——它是通过一套在它自身内部完全自治的“自主性”逻辑，去完成这种翻译的。教师在课堂上给一个学生打高分，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是因为他的论文“真的写得更好”——而这个“更好”的标准本身，已经被文化资本的阶级分布预先塑造了。这个翻译是自动的、匿名的、不需要任何人承担道德责任的。

我必须公正地承认：这套理论已经捕捉到了自噬的一部分。在它揭示的“翻译”过程中，系统的运作（学业评判）完成了对自身支配逻辑（阶级再生产）的加固——这和自噬的核心直觉（系统的自我修正加固了它的深层支配逻辑）确实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布迪厄极其深刻地指出了这个翻译不是通过欺骗或虚伪完成的——行动者（教师、学生、家长）可以完全真诚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恰恰是他们的真诚，让翻译得以完成。这与本文对“自噬不依赖虚伪”的论证同出一脉。

但我必须同样精确地指出：再生产理论的“翻译”，和自噬的“翻译”，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操作，它们在各自理论中的位置和功能根本上不同。

在再生产理论中，“翻译”是系统结构性位置的自动表达。一个教师用学业标准去评判学生——这个“翻译”动作本身，不是再生产理论要去拆解的对象。再生产理论要做的是揭示：这个看似中立的学业标准背后，站着一整套阶级惯习的配置。它的批判锋芒指向的是标准的来源——标准是从哪来的、标准的内容是被哪个阶级的文化塑造的。但它并不追踪：这套标准在被生产出来之后，它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微观的“使用”时刻，是如何在操作层面被维持、被修正、被加固的。因为再生产理论在那个节点上，已经把“翻译”当成了一个由结构自动保证的、近乎无阻力的过程。结构决定了位置的分布，位置决定了行动者的惯习，惯习决定了行动者在具体场景中的“即兴表演”（布迪厄自己用的词）。这个链条太顺了，它解释了一切，唯独解释不了那个在链条的缝隙里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行动者的真心疲惫。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结构自动保证的，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累呢？你只是在执行结构写好的剧本。而那个我一开始写的沉默的人，他不是在读剧本。他是在每一条剧本给出的路上都走不

通之后，发现了剧本没有告诉他的一件事：这个系统真正的支配力，不在剧本的内容里，在剧本对修改剧本这件事的收编方式里。

这就是自噬追踪的那个与再生产理论不同的层级。再生产理论问：这套教育标准在再生产什么样的阶级关系？自噬问：当这套标准自己被置于必须改变的处境下时，那套试图改变它的操作，是如何被它自己的合法性获取机制给拖回原位、甚至推得更深的？前者追问的是“翻译的内容”——翻译把什么翻译成了什么。后者追问的是“翻译的操作”——翻译这个动作本身被什么机制维持着，以至于任何试图修正它内容的努力，都在其操作语法中被消化了。

用一个具体的区分钉死：一个布迪厄式的分析会去研究——在自主招生面试中，什么样的回答被考官认为是“有思想”的，而这个“有思想”的标准，如何暗中更有利于有过长期阅读训练的城市中产家庭子弟。这是对翻译内容的阶级分析，极其有价值。但自噬要去研究的，不是面试标准的内容，而是面试这个通道本身，是如何被一套“公平性必须由不可争议的标准化来保证”的旧语法，给一步一步收拢回分数逻辑的。收编的过程——折算、限额、全程录像、收紧打分幅度——并不直接依赖于哪个阶级的孩子在面试中表现更好。它依赖的是一套更深层的合法性语法：在一个已经被分数驯化了百年信用体系的社会里，任何引入“人的判断”的通道，都必须持续向“排除人的判断”的那套旧规则借合法性，而每一次借贷都在加固债主的独断地位。这个语法，不只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它是比阶级再生产更底层的一层逻辑：它规定的不是“谁被选拔”，而是“选拔这件事本身必须长成什么样子，才能在这个社会里不被推翻”。

这就是自噬不可被再生产理论替代的那一个辨别面。再生产理论解释了：系统如何通过运作自身逻辑来完成支配。自噬解释了：当这套逻辑被推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火线上时，那场改变的努力，是如何被这套逻辑自身的合法性获取机制，给活活摁回原地的。前者解释了支配的坚固，后者解释了对坚固的改变的收编。两者不在同一个理论层级上竞争——自噬必须预设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层结构：确实存在一个不可被轻易挑战的支配逻辑（分数独断、选拔优先）。但自噬追问的是再生产理论没有问的那个下一问：当这个支配逻辑被挑战时，那个挑战它的动作，是如何反过来成为这个支配逻辑最强的维持机制的？布迪厄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理论框架里，支配的维持靠的是认知的误认——行动者没有看到支配，他们以为自己在公正地评判。但自噬面对的场景不是误认——行动者清楚地看到了问题在哪儿，他们真心想要改变它，而他们的真心努力，在操作层面被一套合法性的借贷机制给收编了。这不是看不见的问题，是看见了却改不动的悖论。

4.3 自噬持续运转的动力学

走完了上述两个案例，我现在可以正面回答一个在案例追踪中被隐含却未被理论化地讨论的问题：自噬机器的三个动力——被感知的松动、应激式收编、代谢性加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不是在逻辑上共存的三个“条件”。它们是在时间中依次被前一个动力所激发，并反过来共同维持自噬循环的动力链条。这个链条，必须用过程语言而不是结构语言来写。

第一推动：必须改变与不可真改的夹缝。自噬之所以能在高考、青少年心理健康这类场域持续运转而不是被一次性地耗尽，是因为这些场域都处在同一个矛盾力的十字夹缝中。一边是持续从外部涌入的变革压力——舆论的追问、民意的沸腾、治理层自身的正当性焦虑——这些压力是真实的，它们逼着制度必须不断拿出“新方案”来回应，否则合法性就会流失。另一边是制度核心支配逻辑的道德不可挑战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公平的最后庇护所、“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关爱”作为

人本价值的最后防线——这些道德话语包裹得太紧，任何直接攻击它们的尝试在一开始就会失去公众支持。这两股力的夹缝，是自噬得以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第一推动力。它不在自噬机器的内部，却持续地为这台机器输送着必须被处理掉的动能。

第二推动：动员必须与信任保卫的节奏冲突。正是在这个夹缝中，“被感知的松动”和“应激式收编”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时间节奏。改革要推得动，必须高调宣告——“这次真的不一样”。这制造了被感知的松动。但松动一旦在某处真实地发生（面试成绩开始真正影响录取结果了），它立刻激活了社会对“人的判断不可信”的深层恐惧。这个恐惧如果不能被及时平息，制度就会失去公共信任。于是，改革陷入了一种注定的两难：必须在松动的感知被充分动员起来之后（否则改革根本推不动），但又在松动的实质性后果开始显现之前（否则争议就会大到收不了场）——完成收编。这不是哪个具体的决策者在操盘这个节奏，而是两股合法性的需要——动员合法性与信任合法性——在时间上本来就是错配的。动员合法性需要你话说满；信任合法性需要你事做小。话说满了，事就不得不做小——不是因为你说谎，是因为你做大了就收不回来，而你必须收回来。

第三推动：内部行动体感与外部无力体感的裂缝再生产。当收编逐次发生、代谢逐层加固之后，这套制度的局内人（设计改革方案的人、执行新政策的人、撰写评估报告的人）积累起了一套越来越充实的“我们在努力”的体感。他们有文件、数据、案例来证明他们已经很尽力。与此同时，局外人（学生、家长、一线教师）在他们的肉身经验里感受到的，是那个最核心的支配逻辑“从来没变过”。这两套体感在同一个制度现实中同时增长、各自积累证据、各自强化自身。局内人的“努力体感”越充实，他们越无法理解外部的“没变体感”——“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能说没变呢？”外部的“没变体感”越强烈，他们越不相信局内人的“努力体感”——“你说你在努力，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是被一分压死？”这道裂缝一旦被充分拉伸，它产生的效果是把局内人和局外人关进了两个互相听不见对方说话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那一片沉默，不是行动的终结。它恰恰是自噬在下次被启动时最好的话语真空——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双方都只能通过“再改一次”来向对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三重推动不是自噬的“原因”——因果关系太静态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力能咬合这么多年而不散架。它们是自噬这台机器一旦开始转起来之后，自己生产出来并持续拉紧的三根传动皮带。只要这三根皮带还在绷着，自噬就既不需要一个操控者在中央发指令，也不需要外部输入额外的燃料。它自己给自己加油。

五、怎么打断它：自噬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一篇发生学的论文里，诊断之后如果不给出打断路径，诊断本身就会被指责为“精致的虚无主义”。那个沉默的人，不会仅仅因为我说出了他为什么沉默而感到解脱。他还需要知道：下一次，他能不能不沉默。

本节不提供一套完整的行为方案——方案必须在具体的场域、具体的执行层面、具体的行动者手中才能被设计出来。本文在此处的理论贡献，是精确地指出自噬的三个环节中各自存在的脆弱点，并论证打断的契机可能长成什么样。

5.1 致命脆弱点：自噬同时需要“松动被感知”和“松动能收回”

自噬三动力能咬合在一起，靠的不是某一个环节特别强大，而是三个环节之间没有任何一处断裂。但这也意味着：只要在任何一个衔接点上打出一道足够深的裂缝，整条传送带就会停转。

最容易下手的那道裂缝，在被感知的松动和应激式收编之间。自噬的运转，同时需要两件在时间上紧挨着、却在力道相反的事：松动必须在足够广的范围内被感知到是“真的”，否则下一轮改革的合法性动员就会断供——公众会疲劳，媒体会冷淡，“又来了”这三个字会比任何抵制都更高效地杀死改革。但松动引发的那些实质性后果——被改变了利益格局的人的反扑、被暴露在新评价方式下的不公——又必须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被收回去，否则制度就会在公平争议中丧失公共信任。这两件事里，只要有一件做不成，自噬就会停止。

具体而言，有两个可能性的入口。其一是“让它松到底”——让松动不被收回，让它的实质性后果充分累积，直到那个被它动摇的旧规则的信用评级被彻底质疑、而不是在每一次争议中被重新上贡。这条路极其凶险，它在短期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撕裂和合法性危机，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改革者愿意选这条路。但其二的路则温和得多：让松动从一开始就不要那么“被感知”。这正是自噬的阿喀琉斯之踵——自噬需要大张旗鼓的松动感知来为它提供下一轮的合法性燃料。如果一个改变动作足够小、足够安静、足够不把自己宣称为一场“改革”，它就可能不启动应激式收编的那套免疫系统。不是因为它更聪明，是因为它太小了，不值得被收编。

5.2 微型执行体：在收编的雷达之下行动

高考三十年的教训是：大方案容易被收编，微型执行体才有可能绕过收编。大方案——改科目、增设新通道——在应激式收编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的政策体量太大了，争议一炸，不收回就无法平息。但一个微型执行体，它小到在公众舆论的雷达上根本不会亮起——它不会上新闻标题，不会被写成内参，不会被任何一个利益受损的群体组织起来反对。它只是某个具体场景里的一次日常动作的微小偏移。

设想这样一个小偏移：某个地级市在组织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填写时，要求指导教师必须在档案中匿名写一段至少一百字的学生描述。这段描述的格式不是打分，不是评级，不是比较句（“该生在校表现优异”），而是对具体事件的叙事描述（“他在第二次数学建模活动中提出了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解法，那个解法的思路和我们课堂上讲过的任何一种标准解法都不一样，我当时愣了一下”）。这个动作如果只在某一个学校执行一年，它什么都不是。但如果它在几十所学校、执行五年、十年，它就在无数个被分数统治的日常评价现场中，长出了一层完全不属于分数排序语法的描述性评价语汇。这层语汇不会直接挑战分数的权威——它不要求系在录取决策上，它不威胁任何人的利益。但它也在做一件分数永远做不到的事：它让一个学生被看见的方式，多了一种。这种“多一种”的累积，在短期内完全没有戏剧性——它只是让越来越多的老师、学生、家长逐渐习惯了一件事：分数之外的描述，也可以被当真。

这个微型执行体的特点在于，它不具备应激式收编所需的收回机制。它不是一个“新加分项”，你无法把它折算成一个数字加回总分里。它不是一个“新通道”，你无法通过压缩名额来控制它的影响。它太小了，小到收编的机器找不到一个可以下手把它“翻译”回旧语法的地方。它也太具体了，

具体到一旦在足够多的地方长出来，它就构成了自噬无法用“折算”“限额”“程序透明”那一整套常规工具去吞并的异质层。自噬最怕的，不是被冲击，是被渗透。

5.3 合法停顿：暂时停下改革，作为一种严肃的改革

自噬是用“必须继续改”的紧迫感来维持转动的。每一次改革的收束，都同时为下一次改革的必要性提供论证。在这个永不停歇的链条里，公众、学者、决策者都被教导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停顿就是倒退，不推出新方案就是不作为。

但这个信念本身，就是自噬的最深层产品。如果有人在一次自噬循环收束之后，公开地、认真地、以同等严肃的行政级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先不要急着推出下一项重大改革？我们能不能用三年时间，由第三方去独立追踪已经实施了五年以上的三十项微改革——不是问它们成功还是失败，而是追踪它们在执行的哪一个具体环节上，被一套什么样的旧操作给吞回去了——然后把这份追踪报告公开，作为下一次决策的基础？”这个提议在现有的改革话语里，几乎一定会被斥为“不作为”“拖延”“保守”。但它恰恰可能是第一次真正严肃的改革。

因为自噬最怕的，不是你用力去撞它。它已经演化出了一整套通过收编撞击的能量来给自己加油的机制。自噬最怕的，是你突然停下来——不是放弃，是停下来认真看。你停下改革的那三年，就是自噬的燃料断供的三年。那份追踪报告，不会是一份“政策建议”——它是一张自噬机器的内部构造图。你把这张图公开，就等于把那个一直在黑暗中运转、靠不被看见来维持自身的收编机制，推到了每个相关行动者的面前。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自噬循环的一次系统性停转。

六、但是——这篇论文是不是也在喂它？

一个真正诚实的对手必须被邀请上场。他不是稻草人，他代表了所有在这篇论文里读到了深刻的东西、却被一个更深的、不安攫住的读者。

他会说：你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概念，叫“自噬性稳态”。你用极其耐心和细致的笔触，追踪了系统如何把一次真诚的改革尝试，一步一步地收编回它自己的旧逻辑里去。你甚至给出了如何打断它的操作路径。但我想问你一个也许是这篇论文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你现在写的这篇论文本身，它会不会被自噬收编？

你想想看。你的“自噬”概念一旦发表，很可能被教育政策研究界广泛引用。它会成为反思高考改革、反思教育公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然后，在某一次新的改革方案论证会上，某个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可能会这样说：“我们要警惕自噬性稳态。我们在设计这项改革时，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避免落入‘被感知的松动—应激式收编—代谢性加固’的循环。”他会把“自噬”写进那本厚厚的新方案论证报告的“理论依据”那一章里。然后这个方案在被推动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被告知：“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们连自己可能会怎么陷入自噬都提前想到了。”然后，如果这个方案再一次被收编了，那个收编的逻辑，会将你的“自噬”概念本身——连同它带来的所有“刀刃向内”的真诚反思——一并吞进去，变成下一次证明“我们已经在反思了，所以我们是真诚的”的证据。

到那一天，你的论文会成为自噬的殉葬品。不是因为它错了，恰恰是因为它对得太好了——好到足以被那个系统识别为下一轮话语动员的最佳燃料。

回应：

你没有说错。自噬确实有这个胃口。它能吞掉几乎所有对它的批评——只要那些批评的句法结构是“我发现了你的问题，你需要改正”。因为“被指出问题”这个动作，本身就可以被收编进“我们在反思”的内部体感，进而加固那个最底层的逻辑：一个能如此真诚地自我批评的系统，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但自噬有一个它吞不掉的东西：精准指出这条收编机器的具体零件在哪里，并把它们的运行方式暴露在可以被日常动作干扰的微观尺度上。这恰恰是本文和一篇典型的“批评文章”的最根本区别。一篇典型的批评文章会这样说：“高考改革陷入了路径依赖，我们需要更彻底的变革。”这句话的句法结构，已经把自噬下一轮启动所需的全部燃料都准备好了：它给出了一个诊断（路径依赖），一个目标（彻底变革），一个道德姿态（“我们需要”）。然后系统就可以收编它：把“彻底变革”写进下一轮改革方案的指导思想，启动新一轮的“松动—收编—加固”循环。

本文没有这么做。本文做的是：把一个具体的收编操作——折算、限额、程序透明化、合法性上贡——在它们的发生现场中，一个接一个地指认出来。不是笼统地说“改革被收编了”，而是说：“就在这个节点，这个操作（把面试成绩折算进综合分）完成了收编。它用的是这句语法（‘为了公平必须可比较’）。它的效果是把这个（人的判断）翻译回了这个（分数排序）。”然后，基于这个指认，本文提出了打断路径——不是“更彻底的改革”，而是“在收编的雷达下执行微型偏移”和“合法停顿”。

这两条打断路径，在结构上，都无法被自噬收编。为什么？

因为微型执行体不产生可以被“折算”或“收紧”的合法性赤字——它太小了，小到不值得被收编。而合法停顿根本就不进入“改变—被收编”这个循环——它停掉了循环本身。本文的概念，如果它只是停留在“自噬性稳态”这五个字的命名上，它确实可能被收编。但当本文把这个概念的发生过程追踪延伸到了那些可以被看见、被干扰、被微小偏移所渗透的具体操作环节时，它就不再只是一顶可以被系统拿去戴在头上的“反思的帽子”。它变成了一把手电筒——你能用它去照见，在你自己的日常工作里，收编是在哪个动作上完成的。这把电筒一旦被人拿在手里，系统就无法再收走它。因为系统收编的是话语，收编不了你蹲下来照螺丝的那个具体姿势。

更进一步说，让这篇论文免于被自噬吞噬的唯一保障，不是它在理论上为自己建立了何等精巧的“免疫机制”——那又落回了“创造一个更聪明的收编规避方案”的陷阱。真正的保障，在于这篇论文为行动者所提供的，不是一个可以被写进“指导思想”里的概念名称，而是一个在日常执行的缝隙里进行识别和偏移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依赖任何高层级的政策启动——它依赖的是，当你下一次在办公室里，被要求把一段对学生的描述性评价翻译成一个可加分的数字时，你停顿了那么一秒。你认出了这个动作——它在要求你进行合法性朝贡。而你在认出它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再是不加反思地执行它。你不一定能拒绝这个动作——你可能会被制度和情势逼迫着最终还是做掉它。但你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个“知道”，本身就不是自噬机器的零件。那是你身体里一块不属于它的东西。自噬吞不掉那个“知道”。

所以，这篇论文最好的命运，不是被写进某个改革方案的“理论依据”里。它最好的命运，是被一个普通的老师、一个普通的招生办工作人员、一个普通的心理老师，在某个疲惫的下午读到，然后

对自己轻声说一句：“原来如此。它在那儿。”自噬可以收编一切话语。它收编不了一个人看清动作时的那一秒沉默。

七、结论：手电筒，照在螺丝上

走完这一整圈，我回到本文最初那个谷底的沉默。那个沉默的人，他不是没有话说。他是没有一个可以被对方听见的语法。他如果对别人说，“高考越改越硬”，别人会反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改了三十年，科目变了多少轮？通道多了多少条？你凭什么说它没变？”他没有办法回答这段话。因为反驳他的那个人，在和他使用同一套语言——那套把“制度形式的变化”等同于“制度核心逻辑的改变”的语言。在那套语言里，改革的数量、政策的体量、资源的投入、动员的规模是可以被数出来的；而那个在最底层一直没有被动过的元标准，是数不出来的——因为它不在任何一张统计报表里，它在每一次“为了公平必须这样”的操作条件反射里。它只在具体的动作里。而那个沉默的人，他感受得到那些动作，但他没有一个名字去指认它们。

本文给了这个名字。自噬性稳态，不是贴在现象上的一个诊断标签，不是用来终结追问的终极答案。它是用来让那些已经沉入在制度日常操作中的收编动作，能够被看见、被说出、被争论、被拒绝的语法。它把那个在政策文本里隐身的元标准——分数作为合法性最终仲裁者——推到了前台，并且论证了：这个元标准不是被某个人“维护”着，而是被每一次真诚的改革，在为自己争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反复地重新抬高的。

但这张地图打开来，不是只为了让人们感叹“原来我们都在这里”。它至少完成了三件具体的事。

第一，它说出了那股真诚的力道被耗在什么地方。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吞了，而是被“松动—收编—加固”这个循环给均匀地摊薄在各次不得不做的合法性借贷中。一个自主招生面试的设计者，他当初想让教授去看学生眼里有没有光。但为了让这个“看”不被社会质疑为不公，他被迫把“看”翻译成“评分表上的一个维度”，再翻译成“综合分里的一项占比”，最后翻译成“占比不得超过5%”。在此过程中，“看”这个动作，一步一步褪掉了它当初承载的那个承诺。不是他不真诚。是他每进行一次翻译，都在使用那个元标准（公平必须由不可争议的标准化来保证）提供的唯一合法语法。翻译完成了，承诺也耗尽了。而那个元标准，在每一次被用来解决他制造的公平争议时，都比上一次更不可能被碰触。

第二，它论证了为什么不需要一上来就去撞那扇最重的门。在那扇门的合页上，有一个地方一直在被每天、每个具体场景里的旧动作上着油。那个旧动作，可能只是学期末评语里的一句“该生表现良好”。自噬不打那种巨型的门。它打的是那些可以被一段叙事描述替换掉的旧比较句。就是这么小的东西——让老师写一段一百字的、不包含比较词的叙事描述，替代一句“表现良好”——它一旦在足够多的地方被持续执行，它就在旧秩序的肉身执行层上，长出了一块自噬无法吞并的新肉。因为它不是改革。它是换了一种方式去执行日常。自噬的大循环是为改革而演化的——它吃大方案，不吃日常变奏。

第三，这把“自噬”的手电筒，照见了社会学自身的位置。社会学如果只是反复论证大改革为何无力，它自己就在提供自噬所需的下一次大改革叙事的燃料。而一旦它转向——去精确地命名那些微

型执行体、去追踪它们怎么在被执行、在哪被旧惯性吃掉、又在哪侥幸长住了——它就不只是评论员。它是那些在各自场域里寻找下手点的实践者的同行者。它的理论，变成了一种识别能力：不是告诉他们该往哪里走，而是帮他们看清此刻自己脚下踩着的，是自噬机器的哪一节齿轮。

在走到结尾之前，还必须诚实地说出下一个动作。本文完成了一次对自噬机制的宏观论证与发生过程追踪，并将打断路径锚定在微观操作与合法停顿的上。下一步，这篇论文需要生长出去的方向至少在两个地方：其一，它需要具体的、由一线行动者撰写的“微观偏移实录”。本文所呼唤的“微型执行体”——那段百字叙事描述、那次被暂停的折算动作——绝不是躲在书斋里就能设计完善。它们必须在实践者的手里、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具体场景中，被发明出来，被试探边界，被旧惯性排斥，再被调整。本文的理论，只承诺一件事：它能让这些实践者在遭受排斥时，不再把排斥归因于“我不够努力”或“我不够聪明”，而是认出那个排斥他的结构——然后去找下一个让结构无从下口的小动作。其二，跨场域比较。自噬是否在司法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其他国家的标准化考试改革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异形态？那个元标准在不同的场域里分别究竟是什么——分数的独断权？程序的不可置疑性？效率的压倒性要求？只有将这些比较推展出去，自噬性稳态才能从一个对中国经验的深度切割，生长为一个更普遍的发生学命题。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自噬性稳态仍然会转。但有了一把手电筒，就比在黑暗里用头撞墙要多一样东西。多出来的那一样，叫做：我知道我在撞哪。而知道自己正在撞哪——不是知道自己想要撞开什么——是所有改变真正发生的第一个动作。它不承诺你一定能撞开。但它让你停下来，把手放在墙上，感受墙的温度和纹理。就在手指摸到墙面的那一刻，你已经不在那台机器里了。

证伪条件

以下条件将使本文的核心判断失效：若有实证研究追踪到，在本文判定为呈现自噬性稳态的制度场域中，某一项制度的核心支配逻辑在其已有的变革压力下，被仅通过该制度惯常的改革操作路径（即在已有的话语动员与应激式收编轨道内运作）所实质性替代——即，旧有的元标准被降格为诸多标准之一，且这一降格未触发任何本文所论证的合法性借贷与应激式收编机制——且整个替代过程未启动任何外部的、独立于该制度原有改革轨道的打断机制，则本文对自噬性稳态的理论判断不成立。

换言之，本文判断的核心，不是“改变不可能”，而是“在元标准作为最终合法性仲裁者的条件下，系统内部的改变动能会被结构性地收编”。如果有案例能证明：在元标准依旧握有最终仲裁权的情况下，一次内部的、遵循惯常操作路径的改革，仍能实质性地削弱元标准的仲裁地位——则自噬性稳态的机制论断被证伪。这是本文为自身划定的、可被实证操作所检验的硬边界。

深化增补·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说明：以下各节为编辑在审读时增补，不改动作者正文与核心判断，只补上本文原稿未正面处理的最近邻理论，并把分离线写成可操作的判别。每一条都给出“若观察到什么，本文即错”的对照预测。

与西伯《致命的补救》的分离线：干预失败，与干预被消化

本文以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为主要对手，并把「目标置换」作为核心机制之一使用。但在社会干预研究里，有一本书的书名几乎就是本文的题目：西伯（Sieber, 1981）的《致命的补救：社会干预的讽刺》。他系统整理了社会干预产生反效果的若干机制——功能失调、目标置换、供给不足、成本外化、以及被干预者的策略性适应。

分离线在于**结局的方向**。西伯的讽刺是**干预失败**：预期效果没有达到，或者副作用抵消了正效果，其隐含比较是「改革后不如预期，甚至不如改革前」。本文的自噬是**干预被消化**：改革并未失败，它被系统吸收为自身合法性的补充，吸收完成之后系统**更难被改**。

这给出一个方向性的、可直接测量的差别：把改革后的秩序强度（比如筛选逻辑的统一度、对偏离者的容忍区间、可申诉的路径数）与改革前作比较。西伯的机制预测持平或下降；本文预测上升。若历次改革后测得的秩序强度并未上升，则本文的自噬命题不成立，西伯的讽刺清单已经够用。

本文对此有一份现成的史料可用：自主招生自 2003 年起在部分高校试点，而 2020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2020 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一次改革被下一次改革整体替换。这条时间线正是检验上述方向性差别的天然场地。

与迈耶、罗恩「脱耦」的分离线：说一套做一套，与执行本身就是加固

新制度主义给出过一个极有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改革看起来发生了而实质没变：迈耶与罗恩（Meyer & Rowan, 1977）的脱耦——组织在形式层采纳制度化的新做法以获取合法性，在实践层则与之松散耦合，照旧运行。任何「改革无效」的现象都会首先被送到这个解释面前。

分离线在于**两层是否耦合**。脱耦的前提是**形式与实践分离**：文件写了、牌子挂了、实际没做，因此加固只是合法性的加固，实践层的秩序未被触动。本文的自噬要求的恰恰相反——改革在实践层**真的被执行了**：自主招生真的招了人、真的建立了评审程序、真的产生了录取结果；而正是这些真实的执行，为原有秩序补上了「我们已经尝试过多元评价」这一层合法性，并把改革所动用的资源与话语一并转化为自身的构件。

对照检验因此非常具体：查改革的**实际执行率**。若秩序的加固只出现在形式采纳而实践未变的情形中，则脱耦足够；若加固恰恰随实际执行程度上升而更明显——执行得越认真，事后越难改——则本文成立。这个相关方向是可以在多省多校的执行数据上直接测的。

与卢曼自创生的边界：一般性质，与一个特定操作

「自噬」这个词容易被读成卢曼自创生的另一种说法，此处把边界写清。自创生描述的是系统以自身要素再生产自身要素这一**一般性质**，它对系统如何处理外部否定不作特别规定。本文的自噬是这一性质下的一个**特定操作**：把**针对自身的否定**转化为自身要素。并非所有自创生系统都具备这种消化能力——有些系统会被针对自身的否定击穿，而本文关心的正是哪些条件使消化成为可能（第三章的过程追踪与第五节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本文与卢曼不构成竞争，而是在他留下的一般性质里指认一个可被打断的具体环节。

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

Sieber, S. D. (1981). *Fatal Remedies: The Ironies of Social Intervention*. Plenum Press.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Luhmann, N. (1984/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参考文献（编辑按正文实际引用补列）

原稿正文多处引用以下文献与制度文本而未附文献表，此处按正文实际引用逐条补列，未增删任何引用。其中「目标置换」一词正文作为通用术语使用、未注出处，此处补注其来源，以便读者追溯。

布迪厄, P., & 帕斯隆, J.-C. (1970/2002).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邢克超译. 商务印书馆.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目标置换」术语来源之一）

Warner, W. K., & Havens, A. E. (1968). Goal displacement and the intangi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goa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3(4), 539–555.（「目标置换」术语来源之一）

教育部（2020 年 1 月 15 日）.《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文中明确「2020 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